



河南省“百优人才”文库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ZHENGHE LUOJI YANJIU

当代中国社会 整合逻辑研究

涂小雨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百优人才”文库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ZHENGHE LUOJI YANJIU

当代中国社会 整合逻辑研究

涂小雨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整合逻辑研究 / 涂小雨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 8
(河南省“百优人才”文库)
ISBN 978 - 7 - 215 - 10293 - 4

I. ①当… II. ①涂…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654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53)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 / 32 印张 8.5

字数 26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自2014年开始,河南省组织实施了全省百名优秀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简称“百优人才”)工程,培养了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勇挑重担的青年理论人才,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12个学科专业。两年来,“百优人才”结合各自优势,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服务中央、省委中心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可喜成绩。

2015年,河南省委常委会在听取省委宣传部关于中宣部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汇报时,决定设立河南省“百优人才”文库。这是河南省进一步加强社科理论人才培养支持力度的又一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河南省委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对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高度关注,对全省青年社科专家的高度关心。

这次设立的河南省“百优人才”文库共有20部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个领域,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希望全省社科理论人才以此为契机,密切关注热点,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加快提升能力,推进河南社科

理论工作更好地紧跟时代步伐,更好地适应新的伟大实践提出的新要求,为河南从社科理论研究大省向社科理论研究强省迈进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整合的制度逻辑.....	1
一、社会整合的逻辑结构	1
(一) 政治的逻辑: 稳定与均衡	2
(二) 效率的逻辑: 发展与公平	5
(三) 整合的逻辑: 适应与调整	9
二、制度权威.....	12
(一) 制度的文化基因	13
(二) 制度的公信力	15
(三) 制度的适应性	18
三、制度完善.....	22
(一) 制度边界	22
(二) 制度设计	26
(三) 制度运转	29
四、制度执行力.....	32
(一) 制度执行力的现状	32
(二) 制度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4
(三) 提高制度执行力的思路对策	35

第二章 社会整合的历史逻辑	38
一、无产阶级政党制度整合的理论渊源与现代启示	39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设想	39
(二)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43
(三) 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现代启示	49
二、苏共社会整合的失效	54
(一) 社会整合与权力的垄断	55
(二) 社会整合与意识形态的僵化	58
(三) 社会整合与制度的失效	62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继起	67
(一) 毛泽东与两个“三十年”:革命与建设	67
(二) 邓小平与第三个“三十年”:改革与发展	70
(三) 习近平与第四个“三十年”:变革与转型	73
第三章 社会整合的政党逻辑	78
一、政治底线	78
(一) 思想底线: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78
(二) 政治底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82
(三) 行动目标:坚持党的基本纲领	85
(四) 政治担当:坚持党的基本经验	88
(五) 政治准则:坚持党的基本要求	90
二、纪律底线	93
(一)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94
(二) 党规党纪挺在法律前面就是要求能遵规守纪	97
(三) 要在法律之前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人	100
(四) 党规党纪挺在前面才能防范从违纪走向违法	103

三、精神感召	106
(一) 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	106
(二) 共产党人的重大课题	109
(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机遇	112
四、坚持群众观点	115
(一) 群众路线的历史逻辑	116
(二) 群众路线的现代价值	119
(三) 群众路线的实践启示	123
第四章 社会整合的执政逻辑	130
一、执政合法性	130
(一) 情感的高度依赖	130
(二) 制度的高度稳定	134
(三) 法治的高度权威	138
二、执政视野	141
(一) 伦理视野	142
(二) 法理视野	146
(三) 国际视野	149
三、治国理政新特点	152
(一) 充分相信群众	152
(二) 紧紧依靠群众	155
(三) 广泛发动群众	157
四、执政方式	162
(一) 执政安全的重建	162
(二) 执政方式的现代转型	165
五、社会治理创新	167
(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制度创新 ...	168

(二) 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181
(三) 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	184
六、执政方略	189
(一) 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	189
(二)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94
(三) 重塑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遵循	197
(四) 治国理政方式的深刻变革	201
(五)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204
(六) 新常态下的新设计新战略	206
第五章 社会整合的改革逻辑	209
一、改革实践逻辑	209
(一) 改革环境	210
(二) 改革意识	214
(三) 改革方略	218
二、改革的风险结构	223
(一) 社会共识的不断流失	223
(二) 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变化	225
(三) 利益诉求的急剧分化	227
三、改革的风险效应	230
(一) 风险的集聚效应	231
(二) 风险的侵蚀效应	234
(三) 风险的提升效应	238
四、改革观	241
(一) 新常态:改革全局的整体把握	242
(二) 新高度:制度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246
(三) 新常识:确立法治的最高权威	248

五、走出陷阱: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分析.....	251
(一)重塑政治生态:破除塔西佗陷阱	252
(二)重建社会格局:破除中等收入陷阱	255
(三)重构发展模式:破除修昔底德陷阱	259
后记.....	263

第一章

社会整合的制度逻辑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约束,这种约束塑造了人们的互动结构。制度由正式约束(规则、法律、宪法等)、非正式约束(行为习惯、传统习俗和自我施加的行为准则等)及其实施特征所构成。它们共同决定了社会的激励结构,尤其是经济体的激励结构。”^①就制度领导而言,制度是治理的前提,制度实施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但是制度如何实施则是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制度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所构成,制度本身就包含了制度实施,但是制度的实施与制度的领导不是一回事。制度领导是制度实施的一种方式,但是制度实施还包括其他方式。制度领导强调的是制度要在治理结构中发挥领导作用、引领作用。

一、社会整合的逻辑结构

社会整合须符合一定的逻辑实现最终整合的目标,一是要符合政治的逻辑,即社会整合要考虑到社会政治集团的强弱对比与

① 李·J.阿尔斯顿,斯瑞恩·艾格森,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12页。

力量悬殊状况,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合社会政治运转的现实需要与历史基础。二是要符合效率的逻辑,即要符合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效率的逻辑具有显性的标准,即经济增长率、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社会整体评价标准等。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整合的政治逻辑与效率逻辑可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但也有可能相互背离、冲突不断。最终的结果或者是政治的逻辑服从效率的逻辑,或者是效率的逻辑服从政治的逻辑,或者两者相互适应。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和社会治理的复杂化程度加深,需要各种政治势力、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和手段,能够在社会稳定的框架内实现各自利益诉求的最大化,同时,尽可能把自身的利益建构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进行利益博弈、政治竞争的同时避免政治的纷争与社会的动荡。

(一) 政治的逻辑:稳定与均衡

政治的逻辑就是执政(政权)的逻辑,也就是说,是政党如何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有效运作社会力量、引导政治参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的逻辑。因为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尽管政党政治饱受诟病,但历史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政党制度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政权有序更迭的重要基础。亨廷顿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并特别强调了政党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政府对政党怀有敌意,社会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无政党国家即保守国家;反政党国家即反动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加深了无政党制度的脆弱性。”^①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似乎政党制度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

与现代化进程是统一的,离开了政党制度对社会制度的规范、约束与引领,就不可能存在持续的稳定。那么,政治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任何党派、政治力量与政治人物,无不希望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均衡,这就是政治的基本逻辑。

无论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政治稳定从来都是动态的,不存在静止不变的政治稳定,因为政治变动的深刻程度、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以及国际国内发展的关联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活动的本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珍视稳定与均衡的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逻辑,这是因为在共产党执政前后都面临了大规模的动荡考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甚至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都是在动荡中蹒跚前行,稳定与均衡之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在执政前的动荡与乱局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革命的动因。革命战胜了一切混乱、颠倒与停滞,革命是人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美好理想付诸实施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与壮大,是因为其服从了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社会亟须变革的逻辑。实现革命的胜利是实现中国稳定和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没有这个根本的基础,一切变革、建设、改革与发展都无从谈起。在十月革命前夕,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罗曼诺夫王朝的封建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国际帝国主义战争对国内各民族矛盾、各阶级矛盾的冲击,已经完全动摇了社会统治的基础。尽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重重困难,但革命的逻辑点燃了革命的激情,推翻一切压迫与不公正,实现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土地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成为革命的号角和纲领。在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实现的并不

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而是稳定与均衡——政治、社会与人民生活的稳定与均衡。斗争是为了革命的胜利,革命的胜利是为了实现新的基点上的稳定与均衡,但新的基点上的稳定与均衡绝不是为了再引起斗争与革命,除非这种稳定与均衡真的靠不住。稳定与均衡的考验是在革命之后,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如果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稳定进行评估就会发现,稳定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基本要素。经济动荡、政治混乱、人民分崩离析是动乱之源。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赤裸裸的掠夺、战争、剥削与欺诈。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的洗礼与冲击,经历了自然科学与工业化的大发展,但中间仍然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革命事件。如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令人困惑的是,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市场经济、三权分立、多党制(两党制)、总统制等,仍然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一直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噩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充斥其中的海外扩张、宗教冲突、殖民化等。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稳定是动态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制度之下。即使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不能说是形势一片大好。欧债危机、经济下行、恐怖主义、地缘政治争夺、毒品犯罪,特别是蜂拥而来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更是令西方世界手足无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总是遭到一次次源自人类自身的重大的非理性的考验,因此才有了对稳定与均衡的尊崇与渴求,也因此稳定与均衡才成为了政治逻辑的价值归宿。

社会整合第一个需要面对的就是政治的逻辑,而稳定与均衡成为政治逻辑的价值归宿决定了社会整合的首要价值是稳定与均衡,而不是对公平正义、平等互助以及人道主义等价值的强调。因

为没有稳定与均衡,没有秩序,一切价值都不会再存在。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便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①稳定的政治逻辑并不代表政治生态的一潭死水,更不表明社会公众对稳定与均衡的诉求和支持一成不变。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遵循并使用了动态稳定的逻辑,强调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的有机统一,这里的前提仍是面对庞大政治体稳定的控制与整合。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里,任何激进的改革,任何偏离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底线的变动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拥护和支持。改革要面对各种对现状不满的群体,但又不能彻底打碎旧有的利益格局,这样的改革是颠覆性的,也绝不是执政党所愿意看到的。而发展事关效率,更事关公平。在发展的饥渴阶段,执政党采取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支持,但是这只是在一个特定的阶段而已。超越了这一阶段,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考验。中国社会平均主义传统极为浓厚,人们的心理预期与利益差别的关联度极高,一旦越过社会的心理底线,任何理性的改革举措都很难成功。

(二)效率的逻辑:发展与公平

效率并非是单纯的效率,效率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隐藏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美好追求。试想,如果效率带来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的是更大程度的社会裂痕而不是社会团结水平的提高,如果效率带来的是各个社会集团的辩论、混战、不满甚至兵戎相见,那么这种效率也会最终丧失。马克思主义注重生产关系,注重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尊严和价值。马克思指出了异化劳动导致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最终导致了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这种痛苦的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过程本身体现人的关系,内在地包含着社会的价值判断。但效率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的指标,往往具有任性而为的特征。在获取效率的过程中,人的尊严与价值经常被忽视,物的成长超越了人的成长,并最终淹没了人的理性与价值。社会整合的效率逻辑,就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大众福利水平同步增长的逻辑。但矛盾的是,这种增长往往会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又要求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增长,如果政治参与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增长,就会引起动荡和变革,这是所有政治力量尤其是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整合要着重考虑效率的逻辑,把发展与公平作为效率逻辑的价值归宿。

在矛盾的另一面,即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实现发展的需求与大众不断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期待,也会导致政治系统的不稳定。因此,经济的逻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忽视。但是在不同的政治体中,对效率的追求并不一致。并非效率高的政治体就更稳定,也并非政治体越稳定效率就越高。这里面可能还有其他不可具体量化的因素,如宗教信仰、精神激励、历史传统、民族心理与社会整体价值导向,甚至还有自然条件、社会公众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市场需求的

引导,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前提是市场能够发挥真正的基础性作用。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的概念,这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后来这个概念被称为“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但这种最优化状态从未真正实现过,这只是一种静态的假设,一种在经济循环之外的一成不变的理想模型,只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理论手段。但在动态的治理环境下,就像真理只能无限接近一样,发展只能无限靠近帕累托最优状态,但现实的社会环境还远远无法提供如此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最优化配置。

效率的逻辑本身包含了公平的逻辑,即效率逻辑的核心——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发展、为了谁而发展,而不仅仅是关注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和目标。设想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环境下,即政治形势稳定,国际均势平衡,大众政治参与水平始终处在保守、稳健的水平,没有任何革命的迹象和变革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效率的逻辑本身就相当于发展,发展的逻辑本身就体现了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但现实往往不会这样,尤其是在严酷的革命和变革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力量博弈的态势下,发展必须体现出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即人民在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人民是否掌握了发展的话语权?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今天的使发展成果在更高水平上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充分地表明了效率的逻辑并不必然带来